

卞僧慧 著

天津史志研究文集

卞僧慧初稿

天津地方志资料丛书
(第二辑)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津地方志资料丛书·专辑二

津史志研究文集

卞僧慧 著

◎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史志研究文集 / 卞僧慧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6

(天津地方志资料丛书)

ISBN 978-7-80696-907-6

I. ①天… II. ①卞… III. ①天津市—地方史—研究文集 IV. ①K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9714号

天津史志研究文集

卞僧慧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http://www.tjabc.net)

唐山市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40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907-6

定价: 26.00元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
《天津地方志资料丛书》编修委员会

主任：苏长伟
副主任：毕卫利
委员：于 棣 邹积浩 刘 建
 杨德英 张月光 徐 勇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
《天津史志研究文集》编审人员

主 审：苏长伟 于 棣
编 审：焦从海 韦 恬
文稿搜集：焦从海

永不消沉的夕阳

(代序)

前些天,在奔往会场的车上,学洛姻弟打来电话,说是在僧慧老的期颐之年,部分论文要由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结集出版,要我在前面写篇序文。

初闻此言,真是诚惶诚恐,小子何人,怎敢在这样一位年弥高而德弥劭的长者面前言序?不久得知,此序原拟请不久前驾鹤西去的李老世瑜执笔,二老都是天津学界的闻人耆宿,相得益彰;万不得已,这副担子才落到了我的身上。

僧慧老的这本文集,主要是有关地方史志的论文,分量不是很大,但篇篇简洁、实在;这些历史的碎片,时光的鳞羽,表面上看似有些亚色的暗光,但其内涵却有着金属般的质感。在翻阅这些文章的时候,仿佛使我看到,若干年来,这位百岁老人是怎样用他那简单而平实的笔触,细细地铺就了研究天津历史之路,并缓慢地为一幅幅历史画卷进行细致着色的。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部穿越了快餐式的电子拷贝时代,经历了时间打磨,厚重而深沉的研究成果。

在当前浮躁的名利世界中,这位遐龄老人文集的出版,还使我们感触和领悟到了研究工作中的价值观之一——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僧慧老并非是一位天资聪颖、精力过人的人,但是,他通过自己数十年来踏踏实实、锲而不舍的勤奋和努力,任凭落花流水淡去,终于在九十高龄之后的耄耋之年,著述迭出,达到了学术高峰。这种精神和力量特别让我们感动,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学术上的浮名是短暂的,只

有学术上的价值是恒久的，而且愈久愈醇，愈陈愈香。现在，我们特别需要僧慧老这种严谨、刻苦的治学精神，慎身修永，纯洁我们的学术风气，沉淀和冷却某些过于躁动的学术研究。

生活的追求往往在于生命的追求。僧慧老是天津学术界为数不多的人瑞，有生以来，历经坎坷，青年患病，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箪食瓢饮，弊衣疏食，直至桑榆暮景，生活才得到改善。对于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生存际遇，他都能用谅解和包容的心态，淡然视之，坦然面对。所以文如其人，疏疏朗朗的淡泊，清清爽爽的宁静，构成了这本文集的另一特色。有人说，生命的长度，在于人生的态度，这句话实在太深刻了。尽管酸甜苦辣不是生活的目的，却是生活的全部。人常常处在迷失的边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左右不了生活的舞台，但我们能不能向僧慧老学习，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给自己一个自如的释放空间呢？拥有金钱、名誉、地位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终生幸福；真正重要的，是能够像暮岁尚有大志的僧慧老那样，颐神养寿，做自己喜欢并能够给生活以目标的事情。

我与僧慧老相识之时，他年届半百，待人接物，已是一付谦逊仁厚的长者风度。据我所知，在此后的倥偬岁月中，他在工作上，一直是夙勉从事，矻矻终日，锲而不舍；生活上，一直是克勤克俭，忘怀得失，不求闻达。到了桑榆晚途，终于实至名归。古人云“仁者寿”，从僧慧老身上，深知此语之不我欺。

辛卯春节前，我去学洛姻弟家看望他老人家，谈论了许多学术问题，诸如王国维的年谱应由谁来编纂，赵元任的年谱应该怎样修订，等等，等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百岁老人的思维判断依然是那样敏锐，真所谓“宝刀不老”也。

僧慧老站在一百岁的门槛上，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我想，这本文集的出版，其真正的意义是否也在于此呢？

罗澍伟

写于辛卯年正月初二日晚

目 录

忆师潜叔先生	1
徐光启的屯垦主张和在天津地区的活动	3
《天津三卫志》试探	6
略谈天津名称的由来	12
“火烧河楼”的歌谣	21
有关天津濠墙修建时间	27
从天津开埠前后的变化看近代天津的起点	28
题《城隍会论》	38
吴昌硕与天津	43
对《天津简志》“天津图书馆”一节的意见	45
《天津史地论文选辑》前言	47
天津市地理沿革易知初稿	53
天津史地识小录	67
谈资料的考定	77
天津新中国成立前乡祠卞家述略	79
关于明代卫所设置的通信	90
《津门纪略》作者考	92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纪念梅贻琦先生诞辰百周年	98
天津梅氏先世别考	103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攻防	108
给《天津史志》编辑的一封信	110
关于天津出大殡的陋习	113

南开校名初考·····	115
明代天津出版事业考·····	119
关于明代天津职官问题	
——答王远训同志·····	123
天津地方志考略·····	126
对我馆几位前贤的缅怀·····	158
天津第一家·····	161
徐世昌与天津·····	162
我对研究天津史志的点滴体会·····	165
梅文鼎与张霖·····	168
偶忆大方·····	171
天津英租界的两个抗日据点·····	174
感仁祠	
——天津的魏忠贤生祠·····	181
追怀 1929 年严范孙先生追悼会·····	183
严范孙先生的家世和早岁·····	187
“七七”前后	
——忧患余生录·····	197
试说直沽寨和信安·····	204
试说直沽、海津镇、尹儿湾·····	212
赵元任南开讲演·····	220
缅怀伯伦师	
——在雷海宗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222
历史上的天津“泥雨”·····	229
有关“津门梅家”史料的一封信·····	230
纪念难友刘髯公先生·····	231
附录：	
天津城市发展概略(古代部分)·····	236
后记·····	271

忆师潜叔先生

师潜叔先生罹于难，于今九匝年矣。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余拘系之三日，君来同室。既通姓名，知君为崇德堂翻译，天津益世报董事会秘书，是日自报馆与经理生君宝堂同车赴河西，未至万国桥，为日本宪兵劫持，羈系至此，实荣街日本宪兵队也。九月五日，余与四同学者先后得出，与君言别，以至今日，顽寇服罪逾年，而未闻君踪迹。追怀畴昔，宁已于言。

君奉天主教，见羈之时，手持念珠，每日祈祷，不渝常度。时为言教义及教中圣者旧闻。一日，余问曰：“信主得救，然则将来得救之人，为人教者乎？为善者乎？”君曰：“神惟善是奖？人之得救，在于其善，无分信否。吾人才智有限，若能入教信主，可时与主近，则成善易耳。”

同室刘君髯公，名报人也，因刑伤胫，转侧须人，君将护至勤。余病初愈，体尚孱弱。八月二十五日感寒，体温剧增。君手为按摩，以解其痛。九月一日始，同学者五人，继就质讯。余三日午后就讯，君为长跪祈祷三小时不辍，初不之知，返室君方起，刘君为余言之。

余既出，以君嘱省君家，见君夫人及诸子。余为言君状，夫人因谓余曰：“吾人持教，未敢分寸违，吾夫无死法。然主若别有安排，亦惟勤谨奉主，死生以之，弗去则已。以是奉主，无他虑也。”斯言也，余固数闻诸君，而今乃又闻之夫人。

余与君处不过十八日，君生平大节，未能尽识，谨著当时周旋琐屑。世之知君者，自当有以传君，非余所敢任。

往在羈系中，饮食不能以时，每当饥渴，闻墙外货卖声，三人辄言他

日聚食种种以相娱。呜呼！世事仓皇，死生契别，抚今追昔，临笔凄怆，不自省言之零乱也。

附记：右文草成且二年，未获披露。君尝言雷鸣远司铎最知君，而生宝堂君与君同难。今二君世多称述，而君潜德弗彰，悲夫！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记。

（《天津民国日报·民园》1948年8月7日）

徐光启的屯垦主张和 在天津地区的活动

距今 400 年前,在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的一个商人家庭里,降生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1562—1633)。他在科学技术和政治军事上都有卓越的成就,他对天津地区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多贡献。

一 徐光启的屯垦主张

明朝长期建都北京。但北方,不能充足口应皇室、官吏、军队消耗的大量粮食。每年都要从南方漕运几百万石粮米来,费用极大。到了明朝后期,北方粮食供应更为紧张,逼迫着统治者不得不采纳就地增产的建议。万历二十三年(1595)后,在天津三卫一带开荒垦种的规定,屡屡颁布。不过军垦妨碍操练和战斗,民垦又限制很多,所以“旋举旋废”。

徐光启垦田主张的特异之处,是“劝诱富民”,给予切实保障和出路,反对“限田”、“重税”。他认为“今之举事,正须得豪强之力,而先限之田,可乎?”他说“豪强与下民何害?”“不必限民名田”。

徐光启所说的“豪强”、“富民”是指不“坐食”的经营地主,或新兴的商人兼营农业的。他要求给这些新兴地主以切实保障,主张开垦成熟的田地,不允许当地的“豪右”强夺硬买;垦种的收获,除照规定完纳粮米外,多余的可以按时价出卖,“衙门人役”不许压价收买。如有违犯的,被害人有权控告。他还主张给开垦有成效的人以政治地位和出路。

徐光启的主张既着眼于发展生产、挽救明末危局，又表达了新兴力量的政治要求。他这些独创的主张，是根据他游历全国时细心考察和他在天津三卫垦荒的实际经验得出的。

二 徐光启在天津的活动

徐光启从万历四十一年(1613)起在天津开垦荒田。《年谱》说：是年八月，他因疾请假，“田于津门，欲兴西北水利”，为国家立根本之计，“又岁省东南挽漕百万之费”。在这一年的家书（见《徐文定公墨迹》）中，他详细地叙述他在天津等地方沼田的情况说：其一在天津，荒田无数，至贵者不过七八分一亩，贱者不过二三厘，钱粮又轻。中有一半可作水田者，虽低而近大江，可作岸备涝，车水备旱者也。有一大半在内陆，开河即可种稻，不然亦可种麦、种秫也，但亦要筑岸备水耳。其余尚有无主无粮之荒田，一望八九十里无数，任人开种，任人牧牛羊也。其一处在房山、涞水二县，此则每亩价二钱，近大江可开渠种稻，每人岁可收二三石也。只苦无人耳！我若前番领得家眷及带得几个人来，今番便可留在此做此事了。今只得要归。且两处各有可托的相知，寻觅来都不惧，所以为妙也。不过，事情开始时也遇到了困难。开始，他用南方稻种试种时，每亩用干大粪八石，结果。“是年稻科如碗大，根大如斗，而含胎不秀，竟不收！”后来，经过研究，改变了培植方法。次年，取得丰收，“每亩收米一石五斗”。

他在天津经营“三年大获其利”。三年后的局面，据他家信中反映的情况，有以下几点：①有麦田八百亩，每亩收五斗就可分得二斗，估计一年约可得麦一百五六十石，这样就可“不赔粮，亦留得些做种”。②秋间还可收得几百石粮。③可收得八百石豆（如照麦田分收率计算，当可分得三百二十石），“穀了钱粮，还得少利可做工本”。④还开了烧锅造酒。⑤要从南方家中把放出的银子“作速讨取会来。给烧锅增资”，“又可就近买些无粮田地”。

当时天津一带，荒地多、地价贱、钱粮轻。徐光启陆续把南方的人力和财力调到北方来。他把南方的良种如桑、甘薯、蔓菁、苧麻、苕菒

等,以及观赏花草如五色鸡冠、各色老少年、罌粟、各色凤仙、腊梅等移植到天津。他从外地带来的人并不多,只能“照顾田地”,有的“在天津城中做小生理”,有的在乡间准备种些新品种或进行一些副业生产如造酒之类。大片田地的耕种利用北方当地农民的劳动。他从实物地租中取得利润。又把地租和其他收入用来扩大再生产。直到天启元年(1621)《年谱》还记载他在天津“部署垦辟水田诸事”。后来他受魏忠贤党人排挤,失官,在天津经营的事业,也因“会有尼之者而止”。

徐光启在天津还注意当地的生活和生产经验。他从万历四十三年到天启元年(1615—1621)在北方,七个年头中遇到六年有蝗灾。当时山陕人民迷信传说,奉蝗为神虫,不敢扑杀,而天津则有煮食的习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四十四中记载天津蝗灾说:“臣常治田天津,适遇此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煮食;城市之内,用相馈遗。亦有熟而干之,粥于市者,数文钱可易一斗。噉食之余,家户囤积,以为冬储。质味与干虾无异。其朝哺不充,恒食此者,亦至今无恙也。”所以他主张遇有蝗灾,要鼓励人民兜扑,给钱收买。

从徐光启的屯垦主张和在天津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势力的代表人物的精神面貌的一个侧面和一些资本积累情形,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因素从先进地区的江南扩展到落后地区的北方的过程。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关于明末天津情况的知识。因此,结合纪念徐光启回忆一下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

(《天津日报·学术》1962年第77期)

《天津三卫志》试探

现存天津地方志，以清康熙十四年(1675)薛柱斗纂修的《天津卫志》为最早。至于《天津卫志》的祖本，明代正德十四年(1519)和万历二十年(1592)两种《天津三卫志》，在清乾隆初年(18世纪中叶)就已失传了。

本文拟据所见资料，对明修《天津三卫志》试作探测。

《正德天津三卫志》创始于胡文璧。在此以前，天津无志书。天津建置很晚，虽然金朝有“直沽寨”，元朝有“海津镇”，可是都还没有条件写志书。到了明永乐初年(1404—1406)，才设置天津卫和左卫、右卫，是为“天津三卫”。当时明成祖朱棣设卫的动机，据《明成祖实录》记载：

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军士屯守。(南京印本卷三十二，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二十一日〕)

直沽地属静海、武清，海口地属沧州、宝坻(今汉沽)。武清、宝坻隶顺天府通州，静海、沧州隶河间府。天津三卫是军事建置，“所辖之地，固错综于郡县间”，不属地方，直属北京后军都督府。明代地方志，如现存的《嘉靖河间府志》虽也涉及天津三卫，终因受体例的限制，对于有别于地方区划的军事建置的特殊情况，叙述简略。

天津从设卫到派遣兵备道的八十多年中(1404—1490)，由军事据点发展成“一大都会”，地位日益重要，统治设施日渐加强。正德十四年，吕盛在《天津三卫志跋》中说：

天津之名，起于北都定鼎之后，前此未有也。北近京师，东连

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首建天津及左右三卫以防御之。次及城池，则滨海之险有其蔽矣；次及屯田，则军国之需有其备矣；次及学校，则作养之士有所矣；次及阅场，则讲武之夫有其地矣。国计所当重也，出纳之不得其平，侵冒之或滋其弊，故又设户部分司以监之；民命所当恤也，军民杂处，似不能无纷争之情，商贾所聚，似不能无盗贼之患，故又设按察分司以隶之。

（《天津卫志》卷首）

可见天津三卫的事情，实在不少。编修志书，实属必要。再看弘治三年决定增设“山东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天津等处兵备”时，发给首任副使刘福的敕书：

天津三卫系畿内近地，东濒大海，北拱京师。因无上司鈐束，以致奸盗窃发，军政废弛，地方骚扰不宁。今特命尔整饬彼处兵备，专在天津驻扎。自天津至德州止，沿河附军卫有司衙门，悉听管辖。尔须不时往来巡历，操练军马，修理城池，禁革奸弊。遇有盗贼生发，即督应捕官员率领军夫、民快，火甲，相机扑捕，勿令滋蔓。巡司、驿递衙门损坏，即与修理。兵夫吏役人等，时常点闸。河道淤浅，与巡河御史、工部管河官会议疏浚。运粮官民船只往来停泊，须令人防护，勿致劫害。一应军民词讼，应受理者即与问理。官员有犯：文职五品以下，听尔拿问；五品以上并军职，奏闻区处。其操练一事：河间、德州，已有署都指挥薛瑛专管，尔不必预；天津则分守通州署都指挥同知王宣已尝往来提督，尔须协和行事。但有捕盗事情，应与薛瑛、王宣约会者，计议而行。仍听经该巡抚都御史节制。故谕。（南京印本《明孝宗实录》卷四十五，弘治三年十一月乙未〔十七日〕）

又可见天津兵备道统辖文武军民，事务纷杂，责任重大。没有必要的本情况的资料手册，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

正德十年（1515）胡文璧任天津兵备道后，面对“旷百年无文献之传”的现状，决心创修卫志。先和户部分司主事汪必东商量，汪氏因为“前无纪述，靡所凭据”，不肯承担。胡氏却认为，过去没有，现在还不

修,以后更不好修了。他不怕首创的困难,就“官属、生儒、诸父老所能言者”,周咨博采。“稽方界,核故实,采异闻。授诸生具草,躬笔削而成之”。

原书体例,据张常《万历续修天津三卫志跋》说:胡文璧“前无所因,草创简约,惟艺文独详”。又据彭国光重修牌文,彭氏认为由于卫志没有及时续修,以致天津三卫的“教化之纯疵、风俗之厚薄、贤才之登进、武职之承袭、军民之利病、营伍之更番、建置之兴废、事体之沿革、户口钱粮之增损、祥瑞灾异之互见、御制诗敕之褒封、忠孝节义之纪传、文艺吟咏之标题、寓居隐逸之迁延、物产商贩之盛衰、民谣巷议有关风化者,亦未可轻议不录。……诸如此类,概自正德十四年以后,湮没遗忘,不知其几。何以继盛美而示将来!”

从以上引文中,可见胡志虽属初创,材料还不够丰富,已能有彭牌、张跋中所列各项,实属难能可贵。

志书刚修完,胡文璧就得罪了当时在天津管理皇庄的太监张忠。“逮诣诏狱”。志稿到正德十四年才经其后任吕盛付刻。原版藏在户部分司衙门,后来被焚。印本流传不多,在万历彭国光和张常续修时,原书已极难寻找。

彭、张续修本在万历二十年修成后,又有续修,如万历二十二年梁云龙的申详,就入志中。续修本据彭牌中所提要求:“除原志仍旧外,其余:应补者增之,应革者注之,天津形势、城池、卷首各应图绘者绘之。”看来,其体例较胡氏旧本又有所改进。

可惜清康熙薛柱斗修《天津卫志》时,另立体例:“记载皆以今时为主,其从前沿习,并浮浪之事,概从芟削。”“官职、丁地、赋税,悉循经制,凡经废革者止载大纲,以记事实之所由始。”薛氏还认为“诗文碑记,旧志太繁。惟择其简要者录之。”经过这么一删削,在今天已不能从薛志中追寻明志的面貌了。

《天津三卫志》的体例,如上文所举,可说是比较完备可取的。至于所收资料是否有裨实用,是否能反映当时历史实况,因原书早佚,不能悬揣其全貌。所幸明天津巡抚毕自严,在天启二年(1622),为“北河军

夫”一事，上给皇帝的《河军向隅彼此聚讼疏》中引用了《天津三卫志》作为历史佐证，和工部驳难。现将事实经过，作一综述，借此可见明志编纂的精善，远非薛志所能比拟；就此事所收录的材料来看，原始要终，极能说明问题，也绝非“浮浪之事”。同时，借此还可以具体地了解明代天津三卫实际情形的一个侧面。

明朝每年400万石的漕运粮米，是统治者的重要物质支柱。漕运河道受到非常重视。不只有漕运总督总其成，沿河各地还设官派差，分段负责。在北直隶的运河分为南北两段：北河流域在顺天府属地方，河道400多里，有浅59处，额设军民人夫约1400人；南河流域在河间府属地方，河道650里，有浅95处，额设浅夫964人。

弘治三年天津设道之前，通州分守兼辖天津三卫。天顺年间（1457—1464），顺天府通州武清县耍儿渡口岸冲决，工程浩大。通州分守临时借调天津三卫军夫300多人，协助堵决。完工后又留下守浅。因循未撤，竟成定例。从此每年由天津三卫出315人，分守自河西务到天津北的河道200里，浅22处。每年还办纳桩草柳栽银270两。因为久假不归，借夫苦累不堪，万历二十二年（1594）天津道梁云龙建议，诸军夫每人给月饷一石。这一点补助，实际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倒带来许多麻烦。这些军夫散住在沧州、南皮、盐山、庆云，远离通州五六百里。每年三月，就得到通州报到，然后发往信地修防。长途往返，十分不便。而且，迟到要罚，回家取衣裳要罚，请病假也要罚，罚金每天追银三分。此外又有“看厂名色，衙役使费”，每年也不下一百九十多两。这些军夫到了通州，大大小小的头目认为奇货可居，百般敲诈奴役。军夫被榨取得力尽财穷的时候，只有脱逃。脱逃以后，在逃军夫冒着极大的危险，原卫还得金派补充，负担越来越重。天津三卫的军民，早已难以忍受。加以近期天津三卫本身处境恶化，旧事重提，才有“拔苦救生”的请求。竟引起一场尖锐的争议。

天启二年正是辽东战争吃紧的时候。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在辽东攻城夺地，步步进逼，关外形势十分紧张。这时，天津已成了后方供应基地。衙门林立。过往军队的驻扎、调遣，极为频繁。天津军民负担